责编：王翠娟 E-mail:wangcuijuan2008@126.com Tel:010—62806237

◆学习方法

以经筵为主的中国古代帝王学习制度

□张 军

中国古代帝王的学习，一是自己读书，二是由下臣讲读经史，这后一种活动，我们称之为经筵。究其实质而言，经筵其实就是培养人君的道德操守、学术涵养以及治国理政能力而举办的定期学术讲座。这也是古代君主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经筵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二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统治经验教训。经是治国理政的心法，史是治法。康熙的一段话最有解释力，他说：“经者，虞夏商周治天下之大法也。书传序云：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盖道心为人心之主，而心法为治法之原。精一执中者，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者，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所以明此心之微妙也。帝王之家所必当讲读。”这段话道出了帝王之家讲读经史知识的原因。

“经筵”一词最早见于唐代，于宋代形成完备制度，但皇帝的御前讲席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西周时期，专门负责帝王及储君教育的师、傅、保等官职开始被设置。据《周礼》记载，周代君主教育主要内容为六艺之教，即礼、乐、射、御、书、数。不过，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地位尊崇的师、傅、保等官职逐渐被废止不用，也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自汉代儒家学说获得独尊的地位之后，儒经便成为君王研习的主要内容，设立御前讲席，延师入庭成为汉代帝王教育的主要方法之一。汉武帝时，儒生倪宽善治《尚书》，“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然而，汉武帝的诏儒学之士入内讲经之举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经常之制。甘露三年，汉宣帝于石渠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石渠讲经之后，诏群儒入禁庭讲论经学遂成为常制，这大概就是称其为“经筵之始”的原因。东汉建初四年，汉章帝仿效汉宣帝诏诸儒“会白虎观，讲五经同异”。

虽然汉代尚未有“经筵”这个词，但经筵始于汉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其特点是，讲读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汉代官制中并未设置专司讲读的官职，两汉四百年间，御前讲经者众，但均是授以他职。不过，却已形成讲读官员的赏赐机制。赏赐包括授官及物质性赏赐。除此以外，讲经甚得上意的，还有机会入内教授太子。讲读之官讲经御前，虽是臣子，却兼得“帝师”之尊。儒家素将尊师作为传统，所以讲读官的地位颇为尊贵。西汉辅佐宣帝的大将军霍光曾有语：“人主师当为宰相”。后代讲读官虽也备受尊崇，但始终不及两汉。此外，汉代君主还倡导辩经及互相论难的学风，并亲自兼任儒学裁决者。石渠讲经中的汉宣帝及白虎观讲经中的汉章帝都是学术论难的裁决者。可以说汉代的经筵除了作为君主的学习课堂外，更成为学术论坛，变成学术讨论之所。

李唐统一中国后，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帝王崇学之风复起。唐太宗继位不久即建立弘文馆，诏内学士轮番宿直以讨论经籍。开元三年，唐玄宗以“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为由，诏儒臣入内侍读。开元十三年，唐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设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经筵“于是有常职矣”。唐穆宗时，设置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国家正式设立经筵官职，并有了所属机构。翰林侍讲学士待遇颇高，恩礼尤重。唐代设立经筵官的目的是“从容近对，延访大义”，这就决定了入选者必是“强记博识，待问而不匮，守道而无邪”，可以启迪圣意，对皇帝起到规劝、谏讽作用之人。经筵专门职官的出现是经筵制度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此经筵制度逐渐向正规化、完善化进步，慢慢踏入成熟阶段。

宋代重文抑武的统治方针为经筵制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北宋的皇帝均重视经筵。宋太祖在尚未统一全国之时，就常常召饱学之士入宫讲读。宋太宗“自开宝以后好读书，尝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还时常劝宰相等官员研读经史。更是数次赴国子监听讲，召儒臣入讲之举更是屡见不鲜，此外还正式任命吕文仲为侍讲。真宗设立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官职，将经筵制度推向制度化。其后的诸帝大多于继位初即开经筵，经筵讲学逐步成为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经筵制度无论在职官体系还是运作流程上与前代相比均有较大程度的完善。职官体系日趋制度化、规范化。北宋经筵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职官体系，设置了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崇政殿说书等一系列讲读官职，并规定了其相应的班秩、俸禄、职掌，等等。虽屡有变更，但始终向着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前进。经筵制度亦成为皇权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经筵运行机制。经筵的开讲时间、结束时间、讲读内容及方法、管理机构，甚至连教材的编写都有了较为明确的准则规范。

与宋代相比，明清时期的经筵官地位呈明显下降趋势。整个明代，官员地位低下，被喜怒无常的皇帝杖责也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这决定了明代经筵中的君臣关系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在宋元时代士大夫一直倡导的“坐讲”，在明代几乎成为奢望。清代诸帝并不像明代皇帝那样荒唐任性，在经筵中，他们能够做到尊重讲官。尽管如此，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师儒”的角色。清朝皇权极度高涨，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与尊严几乎被抹杀。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讲官的个性，他们甚至也不再追求所谓的师道尊严。

经筵制度到了明清虽说渐趋成熟，但逐渐仪式化，在帝王教育中由主导地位沦为次要地位。比如，宋代开经筵很频繁。每月经筵开讲的具体时间，或双日讲读，甚至每日开讲。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这样，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且，明代皇帝多为性情古怪之人，常常因沉迷宴乐或其他事务而临时停开经筵。清代规定的开经筵次数较明代更少，清代规定每岁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即便是规定一年两次，很多时候都无法做到。

明清以来不仅是在制度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中，经筵次数较宋代大为减少。如此，其他的教学形式必然应运而生。日讲的出现就是对经筵的一个有效的补充。“日讲”，顾名思义，就是每日讲读的意思。明清以来，除日讲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帝王教学方式。明隆庆六年，出现了“午讲”仪。进呈讲义也是君主教育的一种方式。讲义进呈只是在非经筵时期作为皇帝学习的辅助形式偶尔出现。

日讲、午讲、进呈讲义诸多教学形式在君主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势必排挤了经筵这种课堂形式。如果将明代的每月三次的经筵称为月讲，那么到了清代，经筵只能是皇帝每年就学的开学典礼了。经筵在君德成就中已很难发挥重要作用。这与宋代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书 摘

以体制改革 化解金融潜在风险

□魏加宁

“稳中求进”的金融工作方针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面对国内外的风险，继续保持现有的宏观政策的方向，大方向保持不变，追求体制机制改革，追求经济结构调整，追求发展方式转变；另一方面，以进求稳，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来求得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要避免经济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加快改革。当前，金融领域的具体风险包括：从国际上看，第一，欧债危机，欧元陷入困境；第二，美债危机；第三，日本严重的债务隐患。从国内来看，第一，房地产业金融泡沫破灭可能带来银行坏账上升的风险；第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应对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贯彻“稳中求进”方针，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

目前，民间借贷为什么发展这么迅速，风险这么大？重要原因是：在这一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过程中，一方面，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地提高；另一方面，利率浮动很小，利率基本上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金被从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挤到了非正规金融体系，金融秩序出现了一定的混乱，金融风险不断加大。非正规金融体系的混乱及由此引发的金融风险的本质是负利率导致价值扭曲、资源配置出现问题。 民间借贷问题、房地产业泡沫、地方平台的问题，根本上都和利率没有市场化密切相关。要解决上述问题，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

推动金融机构民营化改革进程

如果要推行利率市场化，可能会引发金融机构高息揽存，所以，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要强化金融机构的约束，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民进”，另一方面是“国退”。所谓的“民进”，是指放开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开办民营股份制的金融机构，放宽市场准入，降低门槛。“国退”则要求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的资金和地方政府的资金从国有的金融机构、商业性的金融机构退出。

应分清市场和政府的责任，政府应使用退出的国有资本，集中力量办好政策性银行。2009年国家开发银行从政策性银行转变为商业性银行，国家政策性银行从原来的三家变为两家。政策性银行商业化之后，商业化银行开始担任政策性银行的角色，响应政府号召，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造成了很大的风险。所以，政府应集中力量办好政策性银行。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回归到政府系统里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原来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提供的，贷款期限一般比较长、成本比较低，所以风险不大。但由商业银行贷款，或是商业银行短存长贷，或是地方融资平台短借长投，风险自然加大。所以，应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向地方政府项目贷款，扶持一些公益性的项目。此外，应该建立至少一两家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性银行。还应该专门有一家进行国际合作的政策性银行，到国外进行经济开发，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扶持在国外的经济建设项目。

推进金融安全网建设

金融安全网如同杂技表演时为表演者安全而设置的网，只有建立了金融安全网，才能够真正放开市场准入，各种金融机构才能在利率管制放开的情况下进行充分竞争，在出现问题时有安全网保护。金融安全网主要有以下三大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审慎监管。首先，建立分业监管协调机制。目前金融领域最大的结构性风险是经营和监管的“混业”结构。一方面我们在力推混业经营，如金融控股集团、金融控股公司；另一方面我们又强调分业监管不能变，这样就带来了很大的结构性的风险，经营和监管不分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因此，应建立一个分业监管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否则金融监管就要出问题。其次，理顺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由于金融领域是垂直监管模式，对由一些地方小型的金融机构开展的企业间借贷等金融业务，监管部门鞭长莫及。而地方政府又没有金融监管授权，因此，应把监管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的金融行为的职责赋予地方政府，而且把监管责任授权地方，即使出问题也是在局部，不会造成全国性的系统性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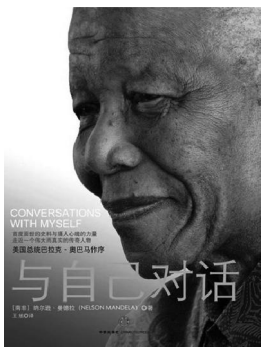
第二个支柱是加强最后贷款人的独立性。从长期来看，金融领域最大的流动性风险是货币发行量太大，如何化解？要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主要依靠建立规范的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要把货币政策决策权下放到中央银行，下放到货币政策委员会，把货币政策委员会从目前的咨询机构变成决策机构。同时，完善决策程序，将决策过程记录在案，适时公开，建立问责机制，以保证货币政策的科学化、规范化。

第三个支柱是建立投资者保护机制。现在公认的存款保险制度最早是由美国人建立的，中央一级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在大萧条时期，美国银行业倒闭了几千家，罗斯福总统上台后第一件事是通过银行法，规定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成立了存款保险中心。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肯定会比现在的情况糟得多。虽然几百家银行倒闭了，但尚没有出现存款人的挤兑，没有出现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存款保险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摘自《中国智库经济观察（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5 月版）。选摘时有改动。

编后语：化解金融风险，作者认为根本出路在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由此提出了金融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建议。该选文中的观点为作者一家之言，值得探讨。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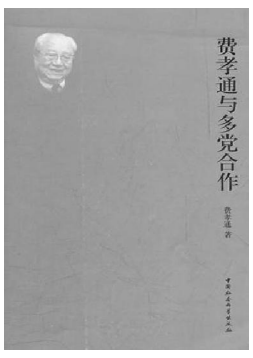
书名：《与自己对话：前南非总统曼德拉传》

作者：[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11年1月

推荐人：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推荐语：在纳尔逊·曼德拉被囚禁在罗本岛期间，我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远距离地对他逐渐有了了解。在多数人的心里，他是南非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公正、公平和尊严的化身。他所做出的巨大牺牲激励着各国人民，促使他们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与自己对话》向我们展示了普通人曼德拉的一幅生活画卷，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件极好的事情。通过跨越几十年的日记、信件、演讲稿、访谈录和其他类似文件，本书向读者展示了曼德拉从平淡的常规监狱生活到做出竞选总统决定的整个生活历程。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一位政治家、一位热爱家庭的男人、一位写出传记《漫漫自由路》的人和一位把梦想和实际结合在一起的领袖。



书名：《费孝通与多党合作》

作者：费孝通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

编者谈书：统一战线与政治协商是我国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费孝通对各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精辟的论断：政治上具有共同目的的人团结起来一起行动，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内既然包含了来自各方面的人，为了实现共同目的，就得在一起商量，使不同意见、不同看法能统一起来。这就是政治协商，商量好了，可以提供权力机关去讨论并立法，由行政机关去执行。他同时认为，国家各项事业建设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在党与广大群众之间要有个结合部，民主党派就是起这种结合部的作用。本书收录了费老的相关文集以供参考。



书名：《中国道路——思想前提、价值意蕴与方法论反思》

作者：欧阳康等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3 月

编者谈书：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决定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反之亦然。我们在探索与完善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继续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中国道路并非一马平川，许多新问题的出现显示出目前它所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本书回答了在走中国道路的基础上要遵循的思想、方针、政策，制定走什么路，怎么走，将会遇到怎样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

◆书海泛舟

毛泽东与书籍

□王德春

根据上级领导和组织的安排，20世纪70年代初，笔者从中共中央警卫局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档案处，从事对毛泽东图书资料的管理工作。他健在时，我们为他保管、整理、借阅图书资料和根据需要印制一些线装书书籍，具体讲就是为他提供图书资料的服务工作，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在图书资料服务工作中，笔者了解到他与图书有关的很多有趣的故事。

毛泽东酷爱阅读历史书籍，在他大量批注、圈画的书籍中，历史类书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从大量的历史书籍中学习、研究中国历史，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经验教训。我们在阅读《毛泽东选集》时就会注意到，选集中所列的历史典籍很多，例如《史记》《左传》《汉书》《资治通鉴》《论语》《吕氏春秋》《老子》《孟子》《孙子》《列子》《庄子》《易经》《山海经》《礼记》等。选集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也不少，例如司马迁、曹操、朱熹、孙武、韩愈、秦桧、魏忠贤等，涉及的历史事件也很多。从以上罗列的历史书籍和历史人物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博览群书、旁征博引和阅读历史书籍的兴趣。

在毛泽东阅读的历史书籍中，《二十四史》是阅读和批注较多的历史书籍，有关章节他反复阅读，例如《史记》《汉书》《唐书》《晋书》《五代史》《明史》等。毛泽东在阅读《二十四史》时谈到，要全面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可不读《二十四史》，“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的确，毛泽东阅读研究《二十四史》是下了精力和功夫的。据有关材料统计显示，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的字迹就多达3583个，仅在《五代史》一书的批注就达19条之多。他批注的内容主要包括历史人物、治国理政、战争战役战术、重大事件以及对史书本身的批注。例如，他在阅读研究《新唐书》第124卷《姚崇传》时批注了两条意见，一条是称姚崇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另一条是对姚崇向唐玄宗陈述的“十事闻”，他批注：“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称之为政治纲领的十条意见，是姚崇针对中宗、睿宗以来严重的政治弊端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希望励精图治，重振朝纲，天下大治。此时的批注含义不言而喻。毛泽东在阅读研究《史记·陈涉世家》章节时提出，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是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患难的干部。毛泽东以此告诫后人，任何时候必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任何时候都要有一大批素质高能干事的干部队伍，这是取得胜利的基础条件。

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酷爱读书学习，但知道他对幽默笑话类书籍也十分喜欢的并不多，特别是知道他晚年经常阅读这类书籍的更是寥寥无几。在毛泽东晚年，由于身体和疾病等原因，他对幽默笑话类书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还清楚地记得，那些给他借阅、印制幽默笑话类书籍的工作情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毛泽东最近想阅读一些幽默笑话类书籍，希望我们尽快提供这类书籍，其中还特别提到包括线装类幽默笑话类书籍。为了尽快提供这类书籍，我们到有关的图书馆、资料室进行查找，其中包括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当时的国家出版局等单位。我们先后查到了部分这类书籍的目录索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找到的书籍只有几种。之后，我们又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北京市有关的文物部门、图书管理部门以及有关的人士，进行认真的查找和了解，结果很有收获，根据回忆和记载，有以下幽默笑话类书籍：《笑话》《笑史》《笑府》《笑笑录》《俏皮话》《民间笑话》《中国古代笑话》《花间笑话》《历代笑话选》《历代笑话集》《古代笑话选》《苦茶庵笑话选》《笑话一百种》《新笑话一千种》《可发一笑》《广笑府》《皇历迷》《滑稽诗文集》《滑稽故事类编》《徐文长故事》《明清笑话四种》《笑堂福聚》《笑林广记》《清都散客二种》等。毛泽东看了这些书籍后，精选其中的《新笑话一千种》《历代笑话选》两种书籍，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印制大字本线装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我们联系了当时负责图书出版管理的国家出版局，开展相关的业务工作，经过印刷厂工人的加班加点，很快印制完毕，并及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两本书籍后认为，这两本书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很滑稽很幽默，根据当时的规定和要求，该书印制后还分发给了有关的领导和相关的人士。之后，我们又根据他的阅读需求，在相对长的时间内查找这类书籍，先后查到了不少书籍，很有收获。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从《笑话书目》中精选了一部分书籍，其中包括《滑稽丛书》《笑话一万种》《新式滑稽丛书》《古今滑稽文选》《笑经》以及《新笑话话篓子》等。在这期间，他阅览了大量的多品种多版本的幽默笑话类书籍。为何毛泽东在这期间花费精力大量地阅读这类书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通过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身体情况来看，不难理解这也许是他调解工作和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他精神世界的一种释放。